

新年上班第一天,茅台保健酒业公司领导们在干啥?

新春新气象,新年新作为。2月13日,是猪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这一天,保健酒业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们及时调整心态,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忙碌”成为主基调。下面,让我们看看,新年上班第一天,领导们都在干啥?

节后上班第一天为员工送祝福

上午9点,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开馥,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赵富刚,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首席质量官陈强,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师承举,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姚晓波,总经理助理席锋、钟正利、宋毅、周丽娟、张显明、程秋带着保健酒业公司党委和经营班子满满的新春祝福,到各部门看望慰问广大员工,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撸起袖子加油干,展现新作为,为保健酒业公司转型发展作出新贡献。

公司领导先后来到机关后勤各部门和坛厂生产系统各部门,一一同员工亲切握手,表达新春祝福。每到一处,员工早早列队迎接,个个员工脸上洋溢着喜庆的笑容,精气神十足。公司领导看到节后第一天所有员工精气神十足,十分高兴,为大家送上新春祝福的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

王开馥强调,2018年是公司转型发展元年,2019年是公司转型发展的第二个关键之年。去年我们各方面的成绩都取得了大幅度的进步,茅台不老酒短短5个月就创造了四千多万的销售收入,数据虽然很小,但是纵比是非常可观的。成绩的取得是靠大家共同努力和奋



●公司领导考察黔醉酒业新办公楼施工进度情况
斗得来的,新的一年,希望大家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的决心和信心,团结一致,以“时不待我、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奋斗,在保健酒业公司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展现全新作为,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赵富刚强调,2019年公司的任务很重,压力很大,我们要有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压力转换为动力,撸起袖子加油干。2019年也是保健酒业公司成立的35周年,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进一步提振信心,克服困难,鼓足干劲,用崭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谋求新的发展,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公司成立35周年献上一份厚礼,为公司的转型发展作出新贡献。

新春佳节,公司领导的关心和关怀在广大员工中引起热烈反响,纷纷表示,新的一年信心更足了,工作更有激情了,在新的一年里,定当撸袖加油,奋发有为,不辜负公司领导的期望,力争为公司转型发展作出新贡献,再创新辉煌。

考察黔醉酒业新办公楼施工进度情况



●公司领导慰问员工

上午10点半,在慰问公司员工后,王开馥、赵富刚、陈强、张显明立即到新办公楼现场,详细了解办公场地布局情况和装修施工进度。王开馥强调,要抓紧时间与黔醉酒业公司对接,及时跟进,确保办公楼装修如期完工,确保中枢办公室顺利搬迁。

去年12月19日,公司生产系统入驻坛厂工业园区黔醉酒业公司,顺利完成了搬迁工作。根据搬迁工作计划,中枢机关后勤办公室也将于3月中旬完成搬迁。

探望慰问员工生病家属

离开坛厂生产基地,时间恰好是中午11点,当得知公司办公室副主任陈勇的父亲生病住院的消息后,王开馥、赵富刚、陈强立即率两办工作人员前往仁怀市朝阳医院,探望慰问生病员工的家属,把公司的亲切关怀送到病床前。

过去的一年,公司提高员工收入,增加职工公积金缴纳比例,调整员工福利物资慰问标准,关怀员工身体健康,为过生日的员工送去



●公司领导与大家合影

祝福,向老党员、困难党员、困难职工开展慰问工作等一系列举措,使广大员工真正感受到了作为“企业大家庭”一员的幸福和温暖。

送下属到新岗位,释放新信号

时针指向上午11点30分,王开馥、赵富刚又马不停蹄地从朝阳医院赶回公司,带领两办工作人员亲自将原公司办副主任黄碧送到新岗位——销售公司综合办,销售公司领导对黄碧同志的加入表示热烈欢迎,对公司在人才方面的支持表示感谢。

王开馥强调,自去年来,公司两办严格要求自己,形成了纪律严明、办事高效的工作作风,希望销售公司工作人员养成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努力开创全新工作局面。通过对黄碧同志的调整,也将释放一个信号:“树挪死,人挪活”,凡是优秀的人才,今后公司都会作出调整,尽量将人才放到适合发展的岗位上去,让所有人都能够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和价值。

赵富刚指出,黄碧同志的加入,为销售公司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黄碧同志任务重大,要多学、多努力,快速熟悉新的工作环境和业务流程,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发扬两办优良的工作作风,认真抓好业务工作,为销售公司发展献言献策。

出席、指导销售公司相关工作

吃过中午饭,稍作休息后,时针指向下午3点,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开馥,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赵富刚又出席了销售公司2019年第二次工作会暨节后收心会。会议对销售公司考勤考核、组织架构设置、经济风险责任制、市场营销政策、营销员培训、茅台不老酒百问百答手册、春交会筹备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王开馥指出,销售公司全体人员应养成做笔记的习惯,克服以往定性思维,话语要去掉“可能、大概、好像、也许、应该”等词汇,要做到今日事今日毕,安排工作后要去追、去查、去要结果;市场营销人员要有处处是营销的思维,搞好市场营销和扩充经销商工作,力争在2019年将销售收入做到10亿元。赵富刚对会议质量作了评价,对工作安排部署给予了认可,并用八个“新”和三个“心”对销售公司2019年工作作了要求。

新春上班第一天,领导和员工们及时调整心态,立即投入到工作中,为公司发展努力着、拼搏着,我们坚信,保健酒业公司必将蒸蒸日上……

(娄艳 黎正勋 张桂钰 吴宗梅)



►►► [上接 P1]

学什么?学三点:

1.中央政府统一规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督地方融资,现在还说到能放的程度。
2.银行应当从背后跳到前面来,应当规定它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是要有严格规定。

3.可以成立一个专业化的、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放到笼子里。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李波:

中国资本市场我概括为5个不足:

1.市场自治不足,我们的市场行政干预是比较多的。
2.中国的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不足。对投资者的保护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司法救济。咱们国家投资者去告是比较费劲,告赢更难。二是监管力度也不足。
3.咱们国家的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不足。
4.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不足。我们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仅比发达国家差,比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都要差。
5.区域市场发展不足。

重点提两点,一个是证券监管,核心应该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用来判断一个公司的质量,也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来维护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数。所以,应该更快全面引入注册制改革。
第二,应该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如果想提高我们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话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目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

综合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近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投资已经进入下行通道。这是符合转型期基本特征的,应该说有一定合理性。但对比日本和韩国转型期的情况,我们下降幅度要比他们大很多。稳投资是有特定内涵的,确实降幅太大了。

稳投资提几点建议:

第一,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现在一说扩大投资,很多人就会觉得要放水了,又像1998年、2008年,这个很麻烦。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和人均的资本存量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

第二,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提高债务率,要避免这些问题,更大程度调动市场投资。靠什么调动市场信心?就是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

第三,政府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

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要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想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的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因为供给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在需求侧实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必要的调节措施。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

大家一说起来是四万亿,其实四万亿,当时说是两年的支出,是把两年当中正常的一般的政府的转移支付那些投资都放进去凑了4万亿,真正里边的刺激政策,无中生有、得用债务支撑的刺激政策就那么两三千亿。为什么出现大水漫灌?是一年增长了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

教训是什么呢?地方政府不承担宏观调控的职责,中央政府调控要承担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货膨胀,防债务率过高。因此,中央政府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包括把地方债务关进笼子里。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

稳预期排在最后,但实际很重要,为什么现在有钱,项目批了,就是不干,因为预期不好。

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保证我们财富的安全,因为40年积累不容易,一旦出问题很麻烦。我估计2019年如果房价真要大跌,估计就更麻烦一点。整个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很差,实际主要来源于财富不安全。所以,稳预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财富怎么安全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2018年是中国民营经济预期最不好的一年。民营经济实际上一再告诉我,不是要优惠,只要公平、平等,提出两个建议:第一,能不能搞理论创新?现在民营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在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的,好像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伟大的理想,我们没法接受这种理论。第二,法律必须调整。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现在同样一个犯罪行为,发生在民营企业、国营企业,法律准则都不同。

所以,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民营企业这两个问题做出切实的调整才行,不能来虚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

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完整性”,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同时又要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的程度。

2018年的统计数字有三个值得重视,一个是GDP的增长,是6.6%。一个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5.9%。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只有3.8%。告诉我们现在应对下行压力,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克服投资增长不足,因为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该是7%—9%,但是我们实际的增长速度连6%都不够。在投资

签约、交款的客户摩肩接踵,排成长队,人山人海,公司喜迎新年“开门红”。

河南矿山公司创始人、党委书记崔培军告诉记者,2019年新春伊始,该公司就迎来了开门红,仅正月初六一天,销售业绩就突破了亿元大关,截至正月初八,3天时间销售业绩1.6亿元,接到单、双梁等各种起重机订单4600余台。

里面又主要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相对滞后,只有3.8%。

减税同时必然会影响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减少了,怎么去解决?有两条路。一个是增加赤字,另一个是减少财政支出。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去研究如何在降税的同时实现财政支出的减少。

“综合改革”话题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

咱们现在改革有很多措施需要做,但是现在比较优先的应该是考虑调整资本布局。

调整资本布局,第一项是调整国有资本划社保。国务院2017年底做出决定,要划10%的国有资本给社保。我现在想划10%是第一步,实际上10%是不够的。但这个方向应该明确。

第二,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还可以在去杠杆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把国有资本从一部分非国计民生领域退出来,然后补充到国有资本一定要干这样的领域去充实资本金,能够降低它的杠杆率,能够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也给民营资本带来一个新的投资空间。

第三,民营资本自身也有一些资本布局需要调整。我们应该提倡的是他融了资以后去投入研发、投入科技,这样发展经济,如果把股权质押的钱都去炒股票、搞房地产,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资本布局。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如果说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以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啃硬骨头。

高质量发展其实也是高难度增长。所以,现在要真正利用好这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具体来讲还是按照十九大讲的,就是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我以为也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关于相关改革的论述落到实处,就会有很大进展。

我想强调一点,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要从过去制定计划经济色彩比较强的规划,手里老想抓一把米,实际上是要制造寻租机会,下指标、戴帽子、挂牌子、发票子,切实转变到建立和维护公平市场秩序的平台上来。如果政府部门确实比企业知道的多,你可以通过发布信息,预测和研究成果来引导社会预期。

改革目标也应该有相应调整,应该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目标。一方面是适应国内高难度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的需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有一个讨论比较少的问题,就是去工业化开始。在新世纪头十年工业增长相当于之前40年的增长,是无与伦比的增长,但是2010年以后,我们的工业化就调转了,现在已经开始去工业化。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很

公司始创于2002年,主要从事“矿源”桥门式起重机、电动葫芦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现有员工3100余人,420余家销售服务机构辐射国内外市场。拥有国内外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3000余台(套),能独立完成车、铣、镗、磨、刨及热处理等工艺流程。建有自己的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中心。

公司产品涉及冶金、矿山、机械、汽车、水

明显,刚好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去工业化的后果是经济增长减速,外需增速下降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比较低。这是挑战。但去工业化也带来很多好的后果,比如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收入分配格局在改善,国内消费比例在上升,储蓄占比在下降。在危机之前老说中国经济失衡,实际上再平衡已经发生了,而且发生得相当快。中国再平衡发生之后,很难再说我们是一个投资推动的经济。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什么样?日本给了很好的启示。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的2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点几,1961年是10.5%。跟中国危机之前差不多。最重要的还是中间这一段,1973年—1993年,日本平均只有2.8%(增长速度)。

老说创新能够提高经济增速,其实创新是提高不了的。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创新,但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当然在过去20年,只有0.2%。对中国来说有极高参考价值,中国当然会比日本做得好一些,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地方很多,同时我们还有改革动力,但我估计离这个数不会差很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

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变”,只有变、只有改革才能稳。

尤其看过去几年,2011—2016年的数据,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无论是按照工业资产的比重来算,还是按照就业的比重算,结论都是非常一致的。

中国经济学家一定要区分开,尽管我们有好多中国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邓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们取得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们有了那些中国特色,我们取得了好的成就。

我用哈耶克的这句话,事实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事实错误的理解就会改变事实的本身。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改革在我们国家来看其实就是涉及到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怎么通过所有权的结构化、社会化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呢?其实就是一个产权制度问题。

要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必须构建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拓创新。

第一个看法,所有权清晰、产权不清晰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产权的构建过程就是“民失利器”过程,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过程。

第三个看法,以中央对地方确权为主线,构建财产权与行政权分别运行的制度框架。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

制造强国战略本身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振兴制造业、推进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是我们走出中等陷阱的一个必要步骤。但问题是我

利、电力、铁路、石油化工等众多行业,畅销全国近30多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到澳大利亚、越南、印度、泰国、肯尼亚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一带一路”市场。

公司先后获“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全国工业企业质量标杆”、“中国机械工业名牌产品”、“河南省省长质量奖”等部,省级各项荣誉300余项。

们不能把制造强国战略完全对等于“中国制造2025”。需要从强调推进中国制造2025,转向现在提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在总体的战略的目标上,要弱化把国外分为几个方阵,然后分别对标和赶超,而要强调我们构造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为全球的制造业发展做出一些原创性的贡献。

第二,在具体的发展思路上,要弱化重点产业的领域选择,突出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一般美国、德国的规划不会具体到有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效率和能力提升的竞争中性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我们抛开强调补贴,而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中性的企业改革,尤其是应该强调共性科研的基础能力的补足。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即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度。

仔细翻阅已出台的政策文件,有以下几个观察:

第一,从决策机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一致,但是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实际上是分歧的内容被拿掉,而有分歧的内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第二,从文风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

第三,文件能否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有很多文件中还是没有体现。往往是为了短期目标,用了行政化手段去改变一些长期性制度,而制度保持稳定实际上是稳定预期很重要的关键。

第四,从执行上看,立法部门化。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

一定要走出认识的误区,才能够走出经济低谷。

什么是认识的误区呢?我认为是两个。第一,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阶段已经到了应该下行的时候,速度就应该低。这个认识的产生,是对一元社会结构来看,但中国是二元社会结构,用一元结构的规律来看它就不对。

中国是二元社会结构,我们的经济增长高峰一定是两个,不是一个。更大的经济增长高峰是十亿人的房车消费,是十亿人从小康水平的消费,像三亿先富人群一样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消费水平。这一波的消费,他们所引领的经济增长周期会更高、更长。

第二个错误的认识,觉得降速是对的,就是因为基数大。基数大就应该降速,这是普遍规律,但这个规律是对一元社会说的,不是对二元社会说的。
(来源:新浪财经)